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2.003

论阳明心学对晚明越地文人性灵思想的影响

范永康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阳明心学推崇人的生命价值和主体意识,强调处于本体地位的“本心”和“良知”,其中包含了“狂者胸次”“自然人性”等性灵思想的萌芽,经由以王畿为代表的龙溪学派和王艮、罗近溪、李贽等泰州学派的演绎,阳明心学中蕴含的个性解放思想得以张扬,进而对徐渭、陶望龄、王思任、张岱等越地文人的文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徐渭提出的“求真绝伪”、陶望龄“自胸膈中陶写出”的作文主张、王思任强调“言己”本色、张岱推崇的“冰雪之气”,无不受到王阳明及其后学的直接或间接的熏陶。不过,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了阳明心学中崇“理”的一面,体现出文化传承的复杂性。

关键词:阳明心学;越地文人;性灵思想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2-0014-07

儒学发展到程朱理学那里,本体世界或理性世界中的“天命之性”“道心”“理”“性”总体上是要辖制现象世界或感性世界中的“气质之性”“人心”“欲”“情”的。到了陆王心学,便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气质之性”“人心”“欲”“情”的地位获得明显的提升。特别是在王阳明哲学,“原来处于主宰、统治、支配地位的逻辑的‘理’反而成了‘心’‘情’的引申和派生物。于是,由‘理’‘性’而‘心’倒过来成了由‘心’而‘理’。由‘性’而‘情’变而为由‘情’而‘性’。”^{[1]244}发展到龙溪学派、泰州学派等阳明后学,程朱理学的著名命题“存天理,灭人欲”已然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欲即天理”,理学体系遂告土崩瓦解。哲学领域的变革也影响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近代转型,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人突破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追求“惊”“艳”“趣”“俗”“骇”“险”,张扬自我,鼓吹性灵,“阳明心学在晚明已深入到文学内部,成为晚明许多士人文学思想的核心”^{[2]535}。与王阳明同为越人的文学家们从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思想中汲取养分,表现出追求个性解放、抒发性灵的审美趋向,如徐渭的“求真绝伪”、陶望龄“自胸膈中陶写出”的作文主张,王思任“言己”本色和张岱的“冰雪之气”,但学界大都将阳明心学

对晚明文学的影响聚焦于李贽、汤显祖、袁宏道,对徐渭,尤其是陶望龄、王思任、张岱等越地文人群体的性灵思想与阳明心学的关联缺少整体观照,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失。

一、阳明心学中性灵思想的萌芽

阳明心学推崇人的生命价值和主体意识,强调处于本体地位的“本心”和“良知”,由此萌发了性灵思想。“性灵”一词意指抒发人的真情实感,在阳明心学中表现为超越世俗羁绊、无挂无碍的“狂者胸次”以及“自然人性”的观点。

(一)狂者胸次

在《王阳明全集》中,有关“狂”的表述达到五十余处,体现了王阳明对“狂者”的倾慕之情。王阳明一开始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狂者,甚或还有些“乡愿”的意思,但是当他与门人回顾在江西平藩的经历后,王阳明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狂者”的境界:“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3]102},即抛开了世俗物质的牵绊和功名利禄的熏染而全然回归自身,向内求得一颗本心。所以,王阳明对曾点的狂者气象持有肯定态度,“点也虽狂得我情”^{[3]650}。曾点来去自如,其无所累形的人生态度带给王阳明极大的激励,他不愿再为成

收稿日期:2022-12-25

基金项目:浙江省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越地性灵诗学研究”(2020YWHJD02)

作者简介:范永康(1972—),安徽芜湖人,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为好好先生而备受煎熬,他更希望未来能够率性而行、率真而活。但王阳明并不打算止步于此,对他来说,“狂者”仅仅是“成圣”的一块跳板,他的道在于“为圣”。他指出,“狂者”远远超出了平常人的境界,但是还不及圣人之境,还需要“克念”。“一克念即圣矣”,在狂者境界的基础上修身养性、严于律己,否则狂到极致便会变成出世主义,不可以“自足而终止于狂”。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狂者胸次”并不是王阳明终极之道,但却是在走向圣人境界的逻辑中介,是最接近圣人之境的了。因此,王阳明推崇并且景仰狂者超越世俗尘缘牵累、无挂无碍的精神境界,以期达到终极理想境界——“成圣”。

究其根本,“狂者”的内在根据还是在于“致良知”。如果说,王阳明强调的狂者气象在于自由奔放,不凝滞于物、不为世俗喧嚣所侵染的自然形态,肯定人在茫茫宇宙、纷扰世俗之中挺立自我的精神品质,那么,能够实现身心的坚守、自我的挺立的关键就在于自家具足、各有自性的“良知”。良知就是自性,就是一个真诚恻怛。王阳明认为,世上的每一种生物都有自性,“自家原具足”。如果没有了这一内在根据,那么外身便无所依靠,只能“枝枝叶叶外头寻”。良知既肯定了个体存在和生命价值,又蕴含着普遍之理和类的本质。因此,王阳明“狂者胸次”的论说,表现为不受外物束缚、光明超脱的独立人格,究其实受到内部“良知”的支撑,重视个体自性的自主品质,具备内在的人格力量,“阳明所谓‘狂者胸次’,是一种豪杰精神,它的基本特征就是顶天立地、自然洒落、无须假借、‘吾性自足’”^{[4]63}。

(二) 自然人性

在朱熹那里,“理”是道德规范和普遍准则,处于至高无上、统领一切的地位。朱熹以形而上的“天命之性”,统摄形而下的“气质之性”,忽略了人“气质之性”中的感性层面,崇尚的是以“天理”为主要特征的先验人性论。但是王阳明将这个等级颠覆了,他不接受程朱理学所言“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的二心,而主张“心即理也”,树立了以“心”为本体的观念。以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论述为例,“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3]94}。王阳明认为,人心人性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旁人所经受的痛苦犹如自己亲身经历一般,大自然的运作规律和自发现象也能使人类产生共鸣。人的

自我意识不再拘泥于内心世界酸甜苦辣的一个小我,而是有着茫茫宇宙般的无穷无尽、绵绵不绝、万物共生的大我;人心也从代表个体意识和主观意愿的小心,升级为具有共同价值标准的大心。王阳明对自然人心人性的肯定和升华,使得人与万物统一的基础本体得以显现,是以“心”为主要特征的自然人性论的萌芽。

因为体认“心”为良知,王阳明所言之“心”便成为了道心和人心、道德准则和自然感性的统一。王阳明一方面赋予了“心”以道德标准,另一方面也无法忽视作为本体之心所自带的离不开血肉之躯的心理知觉的存在,使得“理”与人的生理存在和生命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关于“良知”与“七情”的关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3]97} 王阳明学说中表现出来的对人欲的表达和对主体精神的高度重视,促发了后学譬如泰州学派以感性欲求代替道德规范,高扬个体富有生机活力的自然人性论。

二、泰州学派对自然人性论的发展

从道德理性和主体感性的内在紧张来看王阳明之后王门的分化,可以归结为左、中、右三派^{[5]98}。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在王阳明之后流变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们剔除了阳明心学中普遍义理的方面,更多强调感性的个体存在,极大地发扬了阳明心学中“狂”的一面,也使得王阳明内圣之学走向“自然人性”的逻辑可能变成了思想现实。以创始人王艮为例,他性格高傲狂放,“时时不满师说”,极具个性与反叛精神。抛弃了良知的道德规范的一面,主张良知是“天然率性之妙”。所突出描述的“安身”“爱身”中的“身”,即是一个血肉之躯,一个感性的个体存在,而非道德个体。有关“百姓日用是道”的论说从道出发,论证百姓日用、平常需求是合理欲望。还把“百姓”和“圣人”放在同等的地位,认为尧舜和路人同一,圣人与凡人同一,因为他们都有同一的道,同一的日用条理。出于一颗纵横自由的张狂之心,他所创建的具有同等意识和平民色彩的理论,具有反封建反传统的特点,猛烈地冲击了当时的统治阶级,为后世平民意识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罗近溪是泰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主张

“赤子之心”,也就是“良知”,表现为人的天赋秉性、自然人性。认为成就学问之道的秘诀不在于其他,唯独要做到“放心”。“放心”并不是无心,而是“着在一处”,将视听、耳闻、食味放在一旁,而专注于内心的澄澈自然,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纯真无染,使得良知自由自在、空明活泼、无所牵累,放任生命的自然流动和顺畅无蔽,这是对身心的安适妥帖和个人的主体生命的追求,启迪了后人对主体意识的重视。

真正高举自然人性论旗帜的则是李贽,他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意为天下至美之文,都是出于童心,由一颗赤子之心写成的文章发乎情性、美于自然。绘画也是一样,他讲求形神在也,这种鄙弃画工推崇化工的核心思想就来源于自然的童心发觉。李贽还把“自然”和“真心”联系起来,自然界就是“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皆是“童心”的映射与显现,这和阳明把“心”体认为世界的本体和主宰的观点是一样的。李贽进一步发展了王艮“百姓日用是道”的主张,提出了“穿衣吃饭皆是人伦物理”的观点,更加明确直白地表达自己对权利要求的合理性的肯定,并且把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看成是天赋天生的,天冷了要加衣,肚子饿了要吃饭,都是“童心”使然,无论是高贵官僚还是低贱贫民都是一个道理,在天赋本性上都是相同的。这种论断在《焚书》中更为具体化,李贽把对物质功利和声色乐的追求看作是人生目标,把“好货”“好色”等日常之用和自然欲望看作是人人具有的真“迹言”,“迹言”指的是最基本最普遍最平常的事。所以,李贽公开地把王阳明定义的本体之心看作是私欲之心,直接导致了“从情到欲”的思想转变。作为一个心学异端,李贽才胆兼备,自评“心狂痴”,醉心于真奇和狂禅,毫不避忌地揭露和批判道学的虚伪和无用,认为道学先生如同狗彘,极受尊崇的孔子也并非圣人,因为人人都是圣人,所以没有必要以孔子的行为是非作为衡量个人道德的尺度和标准,这种论断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拉到与平民相等的位置上,极力地否定了孔孟之学,批判理学对性情思想的禁锢和约束,具有狂者心性。

综上,在王阳明那里,狂者胸次和自然人性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而从王艮、罗近溪乃至李贽的发展过程中,阳明心学看重的理性规范渐渐被架空,主观主义和神秘倾向被无限放大,“狂者胸次”变成了突破一切罗网束缚的异端和抗议,真

诚恻怛的心体良知变成了非理性化的“自然人性”,阳明心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他们而对徐渭(更直接地受到王龙溪等人的影响),尤其是陶望龄、王思任、张岱等越地文人的性灵思想产生影响的。

三、对越地文人性灵思想的影响

阳明心学强调心的主宰,阳明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对自然人性的张扬促发了文学领域对主体精神的重视。有学者指出:“越中是阳明的故乡,阳明晚年归越以后,在当地收徒讲学,使心学盛行于浙东一带。阳明逝世后,分流出来的浙中王门一派便主要由王畿、季本、钱德洪等越中士子所创。他们积极讲学,广收门徒,整理编辑心学文献,为传播和发展阳明心学不遗余力。”^{[6]84}徐渭、陶望龄、王思任、张岱等越地文人自然会受到阳明心学的熏陶,并在与泰州学派代表性人物的广泛交往中坚定了这种价值取向,推动了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发展。

(一)徐渭:求真绝伪

徐渭,山阴人,字文长,号青藤老人。徐渭是后生,未能受教于王阳明本人,但他把阳明心学视为“圣学”,并且称王阳明为“我阳明先生”,自豪钦佩之情溢于言表。阳明居住过的“阳明洞”也成了他心之向往的传播正道、追求绝学之地。晚年徐渭自己写作的《畸谱》,列出了他一生中从师的五位人物,分别是王畿、萧鸣凤、季本、钱榘、唐顺之。这中间有三人是阳明心学的代表人物——王畿、季本、唐顺之。季本是王阳明生前的得意弟子,徐渭极其敬重他,“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7]1332},“先生于渭,悯其志,启其蒙……”^{[7]650},季本启迪了徐渭的思想,因此,徐渭对季本的传道授业怀着感恩之情,对他的逝去也无比追思怀念。王畿和徐渭既是师生,又是远房表兄弟,他被徐渭尊称为“龙溪老师”,足可见徐渭的敬仰之情。王畿“以自然为宗”的主张,为徐渭狂放人格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而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又承接王畿,徐渭常常感念于唐顺之对他的知遇之恩。由此看来,徐渭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

徐渭一生便可以用“放浪恣情”来概括。他自评性格为“傲”“直”“玩”。“傲”即孤傲,“直”可解释为直爽,“玩”即放浪轻慢。这种对达官贵族和功利欲望的轻慢和孤傲使得徐渭与其他人格

格不入。当时胡宗宪想要徐渭入其麾下为其谋划,但是徐渭却要求自己的地位与他人平等,不受歧视,入狱后他虽窘迫潦倒也依然桀骜不驯。徐渭的一生狂傲不羁,始终遵循自己内心的安适,从未向现实低头、苟容于世。袁宏道在为徐渭作的传中提到:“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8]716}徐渭不被主流文坛所认可,心中狂傲之气无处可释,便寄情山水,转向文艺作品中释放狂者性情。以其最擅长的狂草为例,表面上看似杂乱无序、一片狼藉,实则纵横捭阖、气势磅礴,饱含着徐渭对失意现实的反叛抗争和生命本能的张扬,具有狂放的美学旨趣。

狂放之气自心而发,以“真我”为旨归。徐渭所说“真我”,实则阳明所言“本心”。徐渭在《涉江赋》中对“真我”进行了阐述:“天地视人,如人视蚁……小大如斯,胡有定界?……勿谓觉灵,是为真我,觉有变迁,其体安处。”^{[7]36}“真我”存在于寸心之间,又存在于没有确定边界的茫茫宇宙之中,来去无察,如能把握好它则内心静定,如果控制不了则放纵逸情。推及其创作,无论是做诗还是作文,都要讲求“真我”。他在《肖甫诗序》中写道:“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是以有诗而无诗人。造於後世,则有诗人矣。……其势必至於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审如是,则诗之实亡矣,是之谓有诗人而无诗。”^{[7]534}徐渭指出,古人之诗以真情为其根本,从情出发,抒写情志。写诗不是刻意为之,目的不在于诗人而在于诗歌本身,但是后人创作诗文时却是有诗人而无诗,原因在于没有真情实感的自然抒发,是为了写诗而设定情感,而情感一旦接受设定非自然流露,诗文便如同一滩失去了源头的死水一样毫无生机活力。徐渭不由得感叹道那些抄袭剿词之作是死亡了的作品,空留诗歌的躯壳,全然失去了诗歌的生命。“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7]458},徐渭认为,唯有“天机自动,触物发声”的作品才可以称得上是有意价值之作。“天机自动”主张情感的自然抒发、顺乎天性,“触物发声”即目遇外界事物,受其感触,不期然而然地激起某种情思。因此,唯有真情真性的自然流露,才能写出天然感触之文字,传达晓畅真我之性情。出于对“真”的执着坚守,徐渭对“伪”深恶痛绝,“伪”如同组绣、淫哇、脆脓,空有其表,令人恶心。由此观之,在徐渭的心

里,他始终执着于“真我”,主张真情、真性。

将“真我”进一步深入,就是要倡导文学作品的语言之本色自然。徐渭在《西厢序》一文中首次提到“本色”：“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凡作者莫不如此。”^{[7]1089}徐渭在这里提出“本色”和“相色”两个概念,“相色”因为替身他人,需要浓妆艳抹进行装扮掩饰,反而失去了最本真的面貌。“贱相色,贵本色”是提倡运用本色流露的语言尽情表达,使得本体之情性没有受到任何凭借束缚地宣泄,成就情感自得、处处本色的文学作品。因此,“本色论”实际上还是对“真我说”的深化,是对阳明良知之说的传承。

(二)陶望龄:自胸膈中陶写出

陶望龄,会稽人,字周望,号石簑,以“歇庵”命名居室,被称为歇庵先生。他毕生笃信王阳明的心学,认为这是最切合实际的“生平所服膺文成最笃”^{[9]380}。他曾说“自阳明先生盛言理学……于是天下闻二先生遗风,读其书者若饥得饱,热得濯,病得汗解。盖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10]159}陶望龄认为阳明道术大明,打破了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后人闻阳明遗风或读阳明论著,灵台清明,病得汗解。

陶望龄受阳明后学影响也极大,是泰州学派的直接承袭者。黄汝亨《祭酒陶先生传》有言:“文成致良知三字符……及门之士龙溪子妙入其解,而近溪子独见赤子本体,慈湖活泼言下,先生闻而知之矣!”^{[9]143}龙溪即王畿,近溪即罗汝芳,二人皆是王门后学的代表人物。“望龄蒙鄙,获以乡曲事先生,受教最久。”^{[10]223}“乡曲事先生”指的是周汝登,他受教于罗汝芳。陶望龄与周汝登的交往十分密切,他不仅感念于周汝登的传授学问之谊,更是与其交为知心好友,惺惺相惜。因此,陶望龄承继了王畿、罗汝芳、周汝登的思想论说,并在此基础上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陶望龄激烈抨击拟古复古之风,反对剽古因袭。“徒取秦汉子史残膏剩馥,钉恒纫缀衣被而合说之,如枯杨之华,只增索然,而不见其所有。迄今而弊极矣。”^{[10]618}他直接抨击取用前人作品中的残膏剩馥,鄙夷经过缝缝补补整合为自己观点的做法,认为这不仅没有承继前人学说的精华,而且是枯杨之华,徒增索然,毫无新意,难以持久。他强调,此等弊极之事会大大影响文坛风气,造成

拟古复古之风盛行,不利于创作个性的展露和发挥。

在此基础上,陶望龄主张诗词文章应“自胸膈中陶写出”。“吾论文亦有二种,但以内外分好恶,不作奇平论也。凡自胸膈中陶写出者,是奇是平为好。从外剽贼沿袭者,非奇非平是为劣……但欲文字佳胜,亦须有胜心。”^{[10]431} 以往评价文章是从“奇”和“平”两方面展开的,“奇”指“文章负奇色”,新颖特殊;“平”指的是题材平常,文字平淡,叙述平铺直白,没有起伏波澜,让人一览无余。但是陶望龄提出了一种新的评判文章优劣的度量标准,那就是以“内”“外”分好恶。“内”即自胸膈中陶写出,抒发的是文人的真情、真性,“外”即外部外在。陶望龄认为,只要文章是自胸膈中陶写出,不论是奇是平,都属于好文章。如果是从外部模拟抄袭,则无所谓奇平,因为这样的作品并不是文人所思所想,没有内在价值,是最为低劣的伪袭之作。所以,想要成就一篇好文章、一首好诗词,秘诀不在于以往所崇尚的惊人之语、新意创新,而“须有胜心”,这是一颗“天然去雕饰”的纯净之心,因为古往今来,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绝不是标新立异之作,而是归于自然、衷于人心的真诚之作。

真情自胸膈中陶写出,诗文便具有了“偏至”之气。人性有所蔽,才有所短,则有所独到之处。“诗之大至是乎!偏师必捷,偏嗜必奇”^{[11]2491},诗因才情而得,故才情不同,诗文不同。如果文人能够顺应性情之气将其延展发扬,诗文便会带上文人特有的秉性气质而别具一格,这对个性化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陶望龄主张诗文自胸膈中陶写出,讲究偏至性气的文学观念,与王畿、罗汝芳等人反对复古的文学旨趣是并行不悖的,是对阳明心学中“自然人性”和“狂者胸次”的进一步发挥。

(三)王思任:言己本色

王思任,山阴人,字季重,晚号谑庵居士。王思任与泰州学派关系密切,多有交往。“公(父承德公)携往见罗近溪、王带水、左宗郢三先生。近溪笑曰:何来一圣童?而王、左二公谓公曰:贤郎当友天下之士。”^{[12]293} 其中近溪即罗汝芳,王带水是罗汝芳的学生,左宗郢是罗汝芳的门人,这三位先生都是阳明后学。王思任还与陶望龄、焦竑等人也有较深交往。“正月,太史焦公漪园招游燕矶、达摩洞、摄山诸名胜。史公弘博端毅,常得

其名言之教”^{[12]343},这是王思任自记与焦竑的交游。

以王艮、罗近溪为主要代表的泰州学派崇尚“赤子之心”,王思任受其影响也推崇以抒写性情来阐述诗歌的自然本质。“《诗》三百,皆性也……性之初,于食色原近。告子曰,食色性也,其理甚直。……国风好色而不淫,若非魁三百篇者乎……此皆性之所呼也。”^{[13]176} 王思任认为,诗三百,皆是出于性情之作,情是性的外在表现和自然流露,诗歌就应当抒写真实感情。《关雎》《国风》等诗词真切自然地表达了人性人情,描摹了食色性也的人类本质和普遍真理,所以才能够成为传世名篇,居于魁首,经久流传。因此,王思任提倡人性的自由表露,主张文人要做到言情、言性,创作出能够感动人心、引起共鸣的作品。他反对模拟,坚决批判袭古仿古之作,倡导文人言己本色,以形成独特的个性风格。

王思任最具特色的就是他的小品文。他好游成癖,极爱山水,“每岁见一绝代丽人,每月见一种异书,每日见几处山水……不辱也”^{[13]162},对比每年见一位丽人,每月见一种异书,王思任对于山水的醉心渴望更为迫切,竟达到了每日得见的地步。他还把这种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对人性解放的追求与文学的特性联系起来,让读者体会到他沉浸在山水之中表现出来的如痴如醉、物我两忘、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予尝论《诗》,《颂》不若《雅》,《雅》不若《风》。盖廊庙必庄严,田野多散逸。与廊庙近者文也,与田野近者诗也。冷然蒙气尽除,天空独语,秀野集意,或在斯乎?”^{[14]27} 与庄严肃穆的廊庙相比,散逸安适的田园生活不是更可爱冷然,更让人为之神往吗?身居于这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乡野田园中,没有了世俗欲望的牵绊和功利的纠缠,人性得以自然而然的展露和释放,文人获得了得闲得适、忘忧忘愁的生活体验,论诗作文自然也是天机自触、天籁自鸣,具有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力量。这和阳明心学个性解放、本心无蔽的内在倾向是相符合的。

(四)张岱:冰雪之气

张岱,字宗子,号陶庵,山阴人。他是明清之际一位重要的阳明学者。张岱一族与阳明心学颇有渊源。高祖父张天复颇受南中王门学派徐阶的重视和赞扬,又与徐渭是县学同学。曾祖父张元忭是浙中王门的重要人物,因闻阳明心学“致良知”之说而顿悟其道,于是从王畿之学,“从龙溪

得其绪论,故笃信阳明四有教法”^{[15]324}。他和徐渭都是王畿的学生,时常接济在狱中的徐渭。其祖父张汝霖接受了阳明思想,和陈继儒、陶奭龄、黄汝亨交往甚密。其父亲张耀芳拜黄汝亨为师。因此,至张岱,山阴张氏已连续五世与阳明心学有着密切关联。张岱本人也极其推崇阳明心学,把良知之说看作是“暗室一炬”,充分肯定阳明心学“致良知”一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崇拜徐渭,认为自己“不必学文长而似文长之宗子”^{[16]63},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徐渭的接续。还称王思任为“年祖”,与他一同整理编辑徐渭的文稿。因此,张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张岱同样秉持“心”为本体的观点,出于本体之心,创作的诗文自然也具有了“冰雪之气”。何为“冰雪”?张岱在《琅嬛文集·冰雪文序》中提到:“鱼肉之物,见风日则易腐,入冰雪则不败,则冰雪之能寿物也。……冰雪之在人,如鱼之于水,龙之于石,日夜沐浴其中,特鱼与龙不之觉耳。”^{[16]19}张岱以鱼肉谷物为切入点,认为自然界的冰雪可以使得这些粮食经久而不败,保持食物的新鲜度和品质。同理,如果人能够具有冰雪之气,则不复烦躁而清净自得,这股冰雪之气对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来讲都弥足珍贵。因此,张岱认为诗文也应具有冰雪之气,“盖文之冰雪,在骨在神,故古人以玉喻骨,以秋水喻神,已尽其旨。若夫诗,则筋节脉络,四肢百骸,非以冰雪之气沐浴其外,灌溉其中,则其诗必不佳”^{[16]54}。诗文冰雪之气的精髓,在骨在神,就像美玉一样纯净,像秋水一样轻盈。概括得之,冰雪之气其实就是由一颗纯净无暇、不受世俗累形、不被利益熏染的本心所发,诗作若得这股冰雪之气的萦绕和灌溉,自然灵气便可游走于字里行间之中,造化神韵俱出。真正冰雪之文,应当不折腰、不入流俗、不投其所好,究其根本,最重要的就是那颗处于主体地位的独到之心,即阳明所言独到之性、独到之良知。

作文做诗须得“冰雪之气”的萦绕,呈现本来面目,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因此,张岱非常看重“疵”“癖”。“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16]175},张岱认为,我们须和有疵有癖的人交往,因为他们身上有着深情和真气,这股深情真气投射在文学作品上,就是难得一见的秉性气质。“余家瑞阳之癖于钱……五人者,皆无意于传,而五人负癖若此,盖亦有不得不传之者矣”^{[16]175-176},张岱列举了瑞

阳、须张、紫渊、燕客、伯凝五人,指出他们各有所癖,所以时时被后人所提及。因此,文人若想要自己的作品流芳百世,也少不了给自己的作品加上“疵”“癖”,形成独特的气质和风格。正是有了这癖好疵处,文章才具有真情实感、特色个性。由此观之,张岱所讲“冰雪之气”和癖好疵处实是他思想中真情真性和狂傲不羁的集中体现,探其本源,也是承自阳明心学。

综上所述,无论是徐渭主张的“求真绝伪”、陶望龄“自胸膈中陶写出”,还是王思任“言己”本色论、张岱的“冰雪之气”,都讲求真情真性的自然流露与狂者气派的兴起激发,这和阳明后学中崇尚自然之欲、感性之身的思想主张是相吻合的。就其整体趋势来看,他们对“狂者胸次”和“自然人性”的偏爱似乎已经突破王阳明本人的心学范畴,因为王阳明所体认的“良知”之中,“理学所设定的道心与人心,亦即天理与人欲先验的分裂和对立被消除了。相反,性与情,亦即良知与七情在根本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内涵就是人心自然”^{[17]98}。他只是主张把天理和人欲统一起来,绝未堕入“人欲即天理”的极端。

不过,越地文人仍部分地保留着阳明心学崇“理”的一面。比如,徐渭在对待“情”和“理”的关系上保留的与王阳明相似的推理缜文之论,“谓理可以兼诗”^{[7]906},徐渭并不反对诗文囊括性理,他既主张诗本乎情,又推许诗中之理。张岱虽然在早期放浪不羁,但在后期也表露出了对恣意肆情的批判。他把人的情欲分为“情公”和“情私”,即率性而中的正欲和不合常规的私欲,认为“情”的宣泄要合乎本然性体的约束,不可恣意而发,蔑视伦理,需要克制和疏导。张岱对“情”的框定和设限使得他的作品兼具性灵妙用和明德道义。因此,徐渭提倡的“真我”说中“真情”和“真理”的兼容并蓄与张岱主张“情欲解放”和“道德严格”的并行不悖,都和阳明心学所强调的“良知”是感性与理性的融合之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知,阳明心学对晚明越地文人人性灵思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2]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北京:商务

- 印书馆,2014.
- [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4]潘立勇.一体万化:阳明心学的美学智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5]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M].吴光,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
- [6]曹诣珍.明代越中心学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7]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8]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9]黄汝亨.寓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10]陶望龄.陶望龄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11]黄宗羲.明文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2]王思任.王季重先生自叙年谱[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 [13]王思任.王季重小品[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 [14]王思任.王季重十种[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 [15]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6]张岱.琅嬛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5.
- [17]肖鹰.中国美学通史·明代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Influence of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the Mind on the Spiritual Thoughts of Literati in Yuedi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FAN Yongk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the mind advocates the human's life value an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emphasizes "true intention" and "conscience" in the ontological position, which contains the sprouts of spiritual thoughts such as "unrestrained mind" and "natural human nature". Through the deduction of Longxi School represented by Wang Ji and Taizhou School represented by Wang Gen, Luo Jinxi, and Li Zhi, the thoughts of personality emancipation contained in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the mind can be publicized, and then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literary thoughts of literati in Yuedi such as Xu Wei, Tao Wangling, Wang Siren, and Zhang dai. Wang Yangming and the later scholar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fluence the propositions of Xu Wei's "seeking truth and avoiding falsehood", Tao Wangling's "writing from the chest", Wang Siren's emphasis on the nature of "speaking of oneself", and the "style of ice and snow" advocated by Zhang Dai. However, to a certain extent, they still retain the respect for "reason" in Yang Ming's philosophy of the mind, reflecting the complexity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Key words: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the mind; literati in Yuedi; spiritual thoughts

(责任编辑 陇 右)